

潮汕历史资料丛编 第4辑

早期华侨与契约华工(卖猪仔)资料

王琳乾 吴坤祥 辑编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汕头市文化局 汕头市图书馆

潮汕历史资料丛编第4辑

早期华侨与契约华工(卖猪仔)资料

王琳乾 吴坤祥 辑编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汕头市文化局 汕头市图书馆

潮汕历史资料丛编第4辑
早期华侨与契约华工(卖猪仔)资料

王琳乾 吴坤祥 辑编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汕头市文化局 汕头市图书馆

普宁市流沙怡昌印刷厂排版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5.3 印张 383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汕出准字第 02006 号

新
知
學
PDG

总 序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于1995年5月间成立潮汕历史文化资料征集委员会,进入有组织、有计划地广泛征集潮汕地方文献资料,迄今已征集到有关潮事及潮人著作、资料二万余册。这对浩如烟海的潮汕历史文化资料来说,仅属一小部分,但仍不失为一份值得珍视的潮汕文化遗产。

征集资料是开展研究的基础,不治史料便不能治史。征集的目的在于开发、利用文化资源。为此,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潮汕历史资料丛编,以本资料库征集收藏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广收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地志办以及留存民间藏书家的有关资料,编辑成专题,其目的,既为推动潮学研究的进一步纵深开展提供资料参考,也为推动潮汕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决策服务。

辑录丛编,我们提出要努力达到三个基本要求:

一是统一规划。要坚持统一体例,整体策划,专题成书,力求科学化,规范化。

二是忠实原著。要采取原文照录,只加标点,不予辨正,力求原汤原味,保留原有观点和论述。

三是尊重历史。要按照兼收并蓄,不加评论,客观辑录,力求如实反映历史轨迹。

编辑出版潮汕历史资料丛编,是一件长期的、系统的文化工程,拟分多辑出版,分辑则按专题完稿先后排列。欢迎一切对潮汕文化和潮学研究的热心人士、专家学者给予积极支持和参与,批评和指正。

凡 例

1.《早期华侨与契约华工(卖猪仔)资料》为潮汕历史资料丛编第四辑。

2.本辑资料是采自文献、方志、专著报刊等,里面有些从侨乡调查中得来,有些从档案中辑出,小部分属未正式发表资料。

3.本辑资料按问题排列,并附上民俗歌谣。

4.辑录资料均保持原貌,并逐项注明出处,各项资料中观点、事实,编者不加评论或辨正。

5.本辑资料如有缺字,则以□代,如有歧义或明显错字,则在原字后边用()内给予注明,以明责职。

6.为有利互证,文中资料从不同来源,故可能有些内容有雷同者,请用者自行酌定取舍,这里录上以供参考。

7.因契约华工不仅发生在汕头,在滨海城市均有发生,为全面看问题,故录部分有关其他城市资料,以说明当时大局情况。

目

录

- 一 华侨和契约华工出洋原因的综述资料(1)
- 二 外国人贩子诱骗、掳掠中国劳工的罪行资料(84)
- 三 在外使节和学者对各洲华工的情况考察日记资料(263)
- 四 潮汕侨乡与华侨、华工的密切关系资料(333)
- 五 中国政府和各埠人民对契约华工的态度资料(366)
- 六 各埠“猪仔馆”的资料(436)
- 七 有关反映华侨、华工的诗歌、民歌、民谣等文艺资料(455)
- 八 后记(480)

一 华侨和契约华工 出洋原因的综述资料

汕头是中国的一个重要侨乡。自鸦片战争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里都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口岸,也是华侨出入境的主要港口。现在,仍是中国的海外侨胞和外籍华人最多的地区,同华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华侨的基本情况

远在唐、宋之间,便有潮汕人远渡重洋到了暹罗等地。明代有澄海人林道乾率众二千人到远交趾、安南、最后定居泰国南部的记载,清初重开海禁,随着与暹罗大米贸易的兴起,潮汕人搭乘红头船出洋谋生的逐渐增多,其中以去暹罗的为最多,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汕头是贩运契约华工的主要港口,大量的贫苦人民,被贩卖到秘鲁、古巴、西印度群岛、悉尼、苏门答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当苦力。仅一八七八至一八九八年,从汕头出口往东南亚各地的契约华工就达一百五十一万人左右。到本世纪初,因天灾人祸而被迫出洋的还是有增无已(减)。据文献记载,一九〇六至一九一八年由汕头去泰国的华侨六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六人,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由汕头去泰国的华侨十七万六千四百一十三人。由汕头出国的人数,长期在国内各口岸列第一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规模的海外移居才告终止。

定居海外的华侨,大多数已经加入当地国籍。这些人入了外国籍的华裔,有着中国的血统,依然是中国的亲戚。目前,汕头旅居海外的华侨和华裔约有六百万人,分布於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百分之八十侨

居东南亚各国,尤以泰国为最多。计侨居泰国约二百九十五万人,新加坡约四十一万人,马来西亚约四十二万人,美国二十多万人,法国十万多人,还有旅居港澳同胞约一百万人。

摘自《中国沿海城市汕头旅游投资手册》1986年北京周报社出版 62-63 页。

潮汕地区是全国著名侨乡之一。华侨和外籍华人约六百万,分布於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百分之八十旅居东南亚,尤以泰国为最。还有旅居港、澳、台的潮籍同胞约一百万人。他们长期侨居海外,在居住国落地生根,与当地人民建立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情谊,对侨居国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们当中,有一大批拥有相当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实业家、著名学者、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

追溯潮汕华侨出国的历史,远在唐宋之间就已经开始了。明代,由於明政府严厉的海禁政策,迫使一些商人如澄海人林道乾率众与政府抗衡,“横行海上三十余年,达交趾、安南、暹罗”,最后到达大年(今泰国南部)定居。这一次共有部属二千人,是潮人大规模旅暹的最早记录,至清康熙六十一年,因听“暹罗人言,其地米甚饶裕,银二三钱可买稻米一石”。准许与暹罗进行大米贸易。澄海县的樟林港便在这时开始崛起。自此潮州人与暹罗结下不解之缘,在国内无以为生的破产农民,只得离乡背井,到樟林港搭乘红头船过番以求生路,他们带着水布、市篮(竹篮),内装一路赖以充饥的甜粿,与家人一起,到樟林妈祖庙拜神,祇求一帆风顺。然后与家人洒泪而别,开始漫长而艰险的海上生活。潮汕地区过去流传的“无可奈何蒸甜粿”的话和泰国潮州义山亭“渡过黑水,吃过苦水,满怀心事付流水;想做座山,无做座山,终老骨头归义山”的楹联,道尽了广大华侨的辛酸!据统计,一八二二年侨居暹罗的华侨有四千四百人,到一八五八年,猛增到一百五十万人。其中百分之六十是从樟林港搭乘红头船出去的。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者在海外的殖民地更形扩大,从经济上加速对这些殖民地的掠夺,急需大批劳动力。而中国国内由於封建剥削的加重和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造成大批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这样,“猪仔贸易”便在沿海各地兴起,取代了自由移民。汕头与厦门、香港、澳门、海口等地,都曾是“猪仔贸易”的主要口岸。据不完全统计。从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五八年,光从南澳和妈屿掠运出去的“猪仔”华工,竟达四万名之多!而这段时间内,仅妈屿一地,就有八千名“猪仔”死亡,弃尸海滩!

一八六〇年,清政府正式承认人民可以出洋。人口贩子便纷至沓来。他们打着招工的幌子,肆无忌惮地进行欺骗活动,并在汕头设立大量的招工馆所(俗称“猪仔行”、“咕哩行”)。其中以英国人口贩子德滴的“德记洋行”最为臭名昭著。汕头市“德记前”这个沿用下来的地名,包含着多少“猪仔”的辛酸血泪!从一八七六年到一八九八年,从汕头出国往东南亚各地的华工约为一百五十一万多。这些出国的“猪仔”华工,在被称为“海上浮动地狱”的船上,受尽折磨,死亡率有时竟达百分之四十五!真是“一溪目汁(眼泪)一溪船!”。

本世纪末,罪恶的猪仔贸易制度受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而有所收敛,但潮汕地区饱受天灾人祸之苦,被迫出国者仍然有增无已(减)。据前日本驻泰国公使馆的调查报告说,“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八年中,从汕头入泰国的甲板客,即达六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六人。”《中国贸易》则记载:“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的七年中,汕头往泰国的华侨即达十七万六千四百一十三人。”一九三六年汕头《侨务报》五、六月份合刊曾说及汕头出国人数,在国内各口岸列第一位。自清光绪三十年至民国二十四年(一九〇四至一九三五年),由汕头出口侨民约二百九十八万人,归国一百四十六万多人,出超为一百五十一万人,占当时潮梅人口三分之一!

摘自《侨乡潮汕》第 57-59 页

广东华侨旅居海外历史

广东地处华南沿海,华侨有其特殊重要的地位。在秦将赵佗称王南越时,开府在番禺,拥有今广东、广西以及安南东京等地,那时已有向外移民。

在海路方面,公元前2世纪的汉朝,就在番禺设有驿长,专管对外的商贾贸易。那时驿使航程,多沿广东的海康合浦,到南洋的婆罗洲、缅甸,远至印度、锡兰等地。东晋佛教高僧法显,在访印度由海路东归后,所著的《佛国记》里曾提及自耶婆提国(即今爪哇)乘商船东北行趋越广州的航线。唐代著名的玄奘三藏法师,他到印度取经,走的虽是陆路,并没有道经广州,但他所写的《大唐西域记》一书,也提到南海的地名。到了唐代天宝年间,由于中南航道交通的改进,广州已有很多印度、波斯、阿拉伯人移入,以理推之,也有华侨移出。宋代朱或所著的《萍洲可谈》说: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到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所谓“住蕃”,就是侨居外国的意思,所以南洋人民尝称海外华侨为唐人,中国为唐山,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汉代管理对外事务的驿长制,到唐代开元年间发展为市舶使制,而宋代市舶司制更由广州一带推到福建的泉州、浙江的杭州和明州(即宁波)等处。

元明两代仍袭旧制,从事官营贸易,中南航运更加发达。例如15世纪初明代三保太监郑和,在前后28年间,奉使七下西洋,每次统率27000多人,驾乘巨舶,历经30多个国家,远至东非洲,规模之大,开我国航海史的先例。郑和出使的动机,虽在进行“官营贸易”,严禁私人商业,但对民间的工商业也起了促进作用。自后我国沿海人民竞相冒险南渡,且能在居留地上拥有相当势力。如曾在暹罗称王的郑昭,父亲是广东澄海人;在大泥(即今北大年)称王的林道乾,是广东惠来人;在印度尼西亚境三佛齐(即今巨港)称王的张瑄,是广东饶平人;在龙月岛称王的张杰诸是广东的潮州人;在西婆罗洲称雄的罗芳伯是

广东嘉应州人；率领船队 60 多艘进攻吕宋岛西班牙统治者的林阿凤，也是广东的潮州人。过去他们出国的口岸，在粤中的有广州，在粤东的有东陇。自西方资本主义东侵后，华侨起了根本的变化。从华南沿海掳掠拐骗去大批“契约华工”，所设立的所谓“猪仔馆”，则多以香港、澳门为据点。至十九世纪中叶，海禁大开以后，广州、香港、澳门以及粤东的汕头、粤西的广州湾（即今湛江市），已成为广东的重要口岸。

所以广东人民的向外移居，早有悠久的历史。除了前面所述的经济、政治等原因以外，近百年来远洋交通工具的发达，亲朋的招引等，也有很大关系。这就是在全国的广大华侨人数中，广东籍的海外华侨，所以会特别众多的一些因素。

摘自《伟大祖国的广东》华侨篇第一节，1959 年

一、华侨旅居南洋简史

华侨移殖国外，以南洋为最早。其移殖之初期，当在汉朝。东汉光武帝十八年时（公元 42 年），汉伏波将军马援侵交趾，部将留守者多，传称马留人。至晋代有高僧法显赴印度求经，由狮子国（今锡兰）乘商船回国，遇风飘泊耶婆提，当时或有少数华侨居住在此。唐末黄巢起义时（公元 879 年），华侨大量南移。唐、宋二代中南互市，中国以茶与生丝向南洋交换香料，华侨移殖者全盛，迨于明、清，称华侨曰唐人。可见唐代移殖之盛，此我中华民族与南洋群岛发生二千年历史关系之铁证也。元代征服安南、缅甸、爪哇及北婆罗洲。明郑和七下南洋，为华侨移民更盛时期。自欧人东来，殖民于南洋，虽有惨杀及苛待华侨之举，然地域开阔，随在需人，非利用华侨不可。19 世纪南洋之华侨，其数激增，可分二类：自由移民及契约移民。20 世纪之初，国内不靖，天灾人祸，相迫而来，亦为促进南移之一原因也。

见李长傅：《南洋华侨概况》，3—4 页，1930 年

二、华侨旅居美洲简史

据美国移民局之纪录，华侨移美早在 1820 年。惟自 1820 年到 1848 年，来美人数甚少，约 40 人左右，多以经商为业。

自 1848 年美国加省发现金矿以后，华侨始大批移殖来美，其增加之速率，颇有可观（1849 年为 761 人，1850 年为 4025 人，1851 年为 12000 人，其时几乎全部居于加省）。1858 年以后更继续增加，至 1890 年共有 107500 人，为华侨移殖美国之最高峰。华工往美，实由美人拓之使来也，当加省初合并美国之时，急于拓殖，而欧洲及本国东部之移民，惮其辽远，来者不多，资本家苦之；开发金矿，建筑铁路，需要劳工甚殷，不能不渡海求之于中国。故今者加省之繁盛，实吾中国侨民血汗所造成者。1884 年遂与中国订立禁约，不准华工入境矣。

见《美国华侨史》，21 页

香港汇丰银行得自由移民之消息最先，先征集第一帮石工 40 人，皆属客家人。于 1849 正月，由港放洋，续第二帮木匠 80 名，以广州人为多，皆乘帆船五月放程赴美。

见《侨声半月刊》第 3 期，1936 年

中国人，主要是工人，在美国西部地区的历史中，起过很大作用，这一点你无疑是知道了。他们开始移民到这个地区，是在 19 世纪 50 年代初期，正是加利福尼亚州有名的淘金热盛极一时的时候。从那时以后的几十年间，在美国西部所有的矿山、森林、牧场和工地里，都有他们在工作。他们修建了加利福尼亚州的主要铁路，特别是在 19 世纪 60 年代后期，铺修了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中部的“中太平洋铁路”的西半段，这是一个英雄的成就。在 19 世纪 80 年代，他们曾经不得不同在“排外法”被通过时达到极点的沙文主义威胁恐吓和暴力行为进行斗争。这个法令严格执行的结果，几乎完全禁止了亚洲移民入境。……在移民的早期，到美国来的中国人一年达 10 万人之多。现

在,尽管政府实施着严格限制的政策,美国还有 11.8 万左右的中国人在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芝加哥和纽约等主要的城市里,都有小块的华侨居住区,其中一些有着中国式建筑和习俗的特点。

见《福斯特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信》,载《红旗》杂志 1959 年第 3 期

三、华侨旅居澳大利亚简史

(一)中国人最早到达澳洲的说法

1879 年澳洲殖民地政府的一位工务局职员,率领一群中国工人在今澳洲北部的达尔文(Darwin)市郊筑路,在海拔 70 尺处的一棵大榕树根间 4 尺深处发现了这尊玉石寿星像。掘得此像的人当时不知道这是中国的产品,便把玉像作了一个模型,送到印度孟买一学院去请求鉴定,但也作不出结论。物主想把玉像送到南澳阿德雷得(Adelaide)市,卖给博物馆,但博物馆也不要。后来英国汉学家费支列特 C. P. Fitzgerald,据此事撰写了《中国人发现澳洲吗?》一文,认为玉像可能是明代郑和部下的一个水手在澳洲北部登陆时偶然留下的。1954 年 8 月,费氏在伦敦举行的国际汉学家会议上报告了此事。有人认为这棵榕树当时已在 150 年以上,故认为这具寿星玉像必在 200 年前被置该处。若如此,则中国人早在(1770 年)英国船长库克之前,已登陆澳大利亚了。

然而,在明代史籍中,与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等人的著作中还未曾找到有关他们去过澳洲的记载,所以,对于中国人是否最先发现或在明初就到过澳洲的问题,尚有待于中外学家共同努力研究探索。

1942 年澳洲悉尼出版的一份杂志《瓦克鲍特》(WalKbout),刊登了澳洲一作家记载澳洲北部史威司岛(SweeysIs.)之事的的文章,其中写道:“这是在加本德里湾中的一个狭长小岛,但这岛有悠久的历史,远在白种人移殖澳洲之前,这个岛已开始其历史……1802 年佛令德

船长环航澳洲时,即曾在此岛登陆,他是第一位到达此岛的英国人,其所乘的调查号船,在由悉尼启航中受损极大。当船在该岛停泊修理时,船员们在岛上掘井得水。他们并发现在附近的一棵大树上刻有许多中国字,并有 1789 的年号。这是亚洲捕参渔人曾到此岛的证据。”其时,为英人船长库克在悉尼登陆之后 28 年,比英人总督菲立浦于 1788 年在澳州建国迟 10 年,但比 1851 年澳洲发现金矿时早 50 多年。如果所记属实,那么,则可作为华人最早到达澳洲的证据,同时也可证明早在澳洲发现金矿以前,中国人已到达澳洲了。

(二)华人移居澳洲的开始(1851 年前)

诚如上述,中国人虽在 1789 年就已到达澳洲,但只是捕参渔人到此,还不是移居或定居澳洲。从现有资料看,华人从中国大陆正式移居或定居澳洲,应该是在 19 世纪二三十年以后的事。

19 世纪二三十年是澳洲畜牧业迅速发展的时期。澳洲自 1813 年以后,澳人和绵羊向蓝山(Blue Mountain)腹地推进后,澳洲的经济获得了生机。由于澳洲畜牧业的发展,澳洲的农场老板已意识到原有劳动力的严重不足,于是有人主张从印度、中国或太平洋岛上招募工人来澳。当时,一位英国人韦克福认为:“在亚洲人中,中国人最为勤劳,并富于技巧。他们不但可以弥补澳洲垦地劳工的缺乏,并可在一个世纪内把这片广袤的荒漠,化作一个茂盛的田园。”

第一批华人移居澳大利亚的经过和确切时间,现在还很难有定论。下面几件史实,提供了早期华人来澳谋生的一些情况。

据西方文字记载,1823 年中国工人至澳大利亚。

据南澳 SACA 的民族事务委员会调查的资料表明:第一个到南澳来定居的中国人叫汤山(Tim Sang),他是一位家具商,1840 年曾向一个政府部门投标。又从南澳人口调查数字表明,1836 年—1860 年,该洲有 60 位中国血统的永久居民。

据 1837 年 6 月份悉尼《先驱报》(Herald)报道,英国人在厦门征

得数名劳工来澳。越年至 1840 年,由新加坡及厦门,通过华人代办,断断续续运出数百人在悉尼拍卖,强壮的卖至 11 镑,弱小的 2 镑至 5 镑,给英国或爱尔兰人作“货办”,合同是三年或五年不等。

1848 年英国驻华的商务参赞鲍恒(Sir George Bonhan)向英国政府报告,有大批华工正由厦门启程前往澳洲之新南威尔斯(New South Wasle)。1849 年 2 月,英国殖民大臣即令该州总督费智洛(Sir Charles Fitz Roy)加以阻止。可见当时由厦门赴澳华工之人数必定不少,才会引起英国政府之注意。据厦门英国领事馆的报告材料称,1849 年由厦门赴澳洲的华工为 270 人,这些人大都在新威尔斯州英国经营的牧场内做工。

在 1851 年澳洲淘金潮以前,华人大规模移来澳大利亚及其在澳的工作生活情况,卢默然女士(Morag Loh)撰写的一篇文章的记载较为详细。文章说:“在 1848—1850 年左右,已有来自厦门、新加坡、上海的 2000 余名华工在牧场工作。他们都是与澳洲农场老板订有契约而来此工作的。大多数在菲立浦港(Port Philip,即今墨尔本港)地区。1848 年首批工人在吉隆港(Geelong,今墨尔本西南部)上岸时,吸引了无数当地居民的围观。大部份居民在他们一生中从来未见过黄皮肤黑眼睛的亚洲人。”当地的新闻记者,对这些新来的华工形象也作了详尽的报道:“他们都穿着黑色的棉衣和宽大的裤子,水手的帆布袋;他们穿着方头鞋,鞋上有漂亮的丝带,鞋根有 1.25 英寸厚。他们表现出老行家的姿态,拿自己的行李。”

早期的华人来到澳洲后,主要在澳洲的东南部从事农业种植和畜牧业工人的工作。当时澳洲的农场主或老板,原先是利用英国的囚犯来修路、建屋、饲养家禽和从事农场垦植工作。许多大公司和有钱的家族,就是靠这些廉价的劳工起家的。旋至 1840 年英国政府停止将囚犯输至澳洲以后,牧场主老板就雇佣华人来干这些工作。有些牧场主把华工当机器一样使用,让他们作欧洲人的工种,但却付少得多

的工资。例如,每年三个白种工人看 1000 只羊要 150 英镑,但是做同样的工,中国工人只拿到 60 英镑。也就是说,华工比欧洲白人少拿了 60% 的工资。

这批先于澳洲挖金潮的早期华人移民,有些不堪牧场主的虐待和低微的工资,也有与老板争待遇要求增加工资的,但却被牧场主以违反契约的罪名送回中国。有的在契约期满后回到了家乡,等到挖金潮开始,他们又重来澳洲做工。

(三) 华人移居澳洲的发展(1851—1900 年)

19 世纪下半叶是中国大陆移民澳洲人数迅速增加的一个时期。

1851 年澳洲的维多利亚(Victoria)和新威尔斯州等地相继发现金矿以后,从欧美各地涌来了成千上万的淘金投资者和工人。发现金矿的消息也很快传到香港和广东南部各地。经营澳洲和中国之间的轮船公司,为了招徕旅客,也在香港大量散发中英文的宣传品,把澳洲说成是黄金遍地的天堂。因此,以广东南部沿海各县为主的农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成群结队,抛妻别子,想到澳洲去发黄金财。当时澳洲发现金矿以维多利亚省的墨尔本附近各地为最多,因此墨尔本也立刻获得了一个令人神往的别名——新金山,以别于美国发现金矿的旧金山。直至今日,一些历史学家编写澳洲华人历史时,仍把墨尔本附近的地区称为“新金山”。

19 世纪 50 年代初期,数以万计的华人从中国大陆的广东和福建等地来到澳洲,主要是从悉尼和墨尔本等地上岸,然后成群结队蜂涌到维多利亚和新威尔斯,盛产金矿的班迪谷(Bendigo)、巴拉辣德(Ballargt)、阿窝卡(Avoca)、俾兹活斯(Beechworth)、杜木德(Tumut)、扬格(Young)、威灵顿(Wellington)和巴利斯德(Bathurst)等地,便成了南来华工淘金的集中地。许多矿区都有唐人街(Chinatown)的设立。在唐人街内,除了杂货店、药材店、洗衣店和餐馆外,还有赌馆、鸦片馆和庙宇的设立。这些唐人街的具体情况,在澳洲的地方史上都可找到生动的

记载。

华人至澳的路线和人数

19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华人移入澳洲有三条海道可走。一由厦门,一由香港,一由新加坡。由厦门和香港去的,主要是福建南部和广东南部沿海各县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大都在澳洲的东南部新威尔斯、维多利亚和昆士兰州各港口登岸;由新加坡去的华人,则多在澳洲西部珀斯(Perth)登岸。

厦门是华人最早移居澳大利亚谋生的主要口岸。

在 19 世纪下半叶的契约华工盛行时期,外国资本家转运劳工集中在中国的南方沿海城市,如厦门、汕头、广州、香港、澳门等地。据记载,西方国家掠贩中国“苦力”(劳工)是从厦门开始的。从 1847 年起至 1852 年 3 月止,由厦门出国的契约华工共 12154 人,据驻厦门的英国领事馆的报告,1851—1852 年便有 2666 名华工由厦门运往澳洲。1852 年厦门人民反对英国掠贩中国劳动力的斗争,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从此,外国掠夺中国劳力人口的中心便转移至广东沿海的汕头及香港、澳门等地,这就是为什么在 1852 年以后移居澳洲华人大都来自广东南部沿海一带的原因。

香港则是 1852 年以后华人移居澳洲的主要口岸。

据有关资料记载,1854 年维多利亚州华人只有 2340 人,1857 年上升至 25424 人,是年该州矿工人数占该州人口 13.6%,而华工占其中的 6.2%,这些华工主要来自广东四邑。

又据澳洲政府统计的数字,1861 年新威尔斯州华人为 12986 人,维多利亚州华人为 24732 人,昆士兰州为 538 人。

1870 年以后,昆士兰州一些地方又相继发现金矿,吸引了不少华人前往开矿。至 1877 年估计该州也有一万多华人。

综上所述,19 世纪 50 年代至八九十年代,从中国大陆移居澳洲谋生的人数,约在 8 至 10 万人左右。